

李知意

沈嘉

王昌

江文斌

徐文

陈志为

邓心

邹道

徐文

王昌

邓心

王昌

王昌

王昌

王昌

王昌

王昌

王昌

王昌

王昌

王昌

王昌

王昌

王昌

谨以此书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致敬那个火热的年代

20世纪80年代
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

姜红伟 编著

JIANG HONGWEI WORKS



1977XXX-198XXX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太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歌年代：20 世纪 80 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 / 姜红伟
编著. —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5
ISBN 978-7-5378-5569-3

I. ①诗… II. ①姜… III. ①诗歌史—研究—中国—
当代 IV. ①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5128 号

书 名：诗歌年代——20 世纪 80 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
编 著：姜红伟
出 品 人：续小强
策 划：刘文飞
责任编辑：高海霞
书籍设计：张永文
印装监制：巩 璠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 真：0351-5628680
网 址：<http://www.bywy.com>
E - mail：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字 数：498 千字
印 张：34.75
版 次：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5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78-5569-3
定 价：128.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谁能同时站在两条彩虹的上面

徐敬亚

按结绳记事的古法,1976年绝对是中国之绳上一个特大疙瘩。万马齐喑的十年浩劫之后,一首晚清七绝充当了郁闷民族压抑心声的出口:“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一悲愤到斗胆劝天的诗句,频繁出现于中国报刊的结果,不仅鼓舞了“人才”们日渐恢复的雄心,也可能暗中提醒了正梦想开创新政的决策者。

人才,从来就是说有就有,说无就无,它随时暗藏在天空的云朵深处。而漫天大雪从来是无中生有、说下就下。新时代的价值标尺一旦确立,自由与尊严之光,立刻照亮了无数平民百姓的壮志前程。

高考,果敢而神速地恢复,预示了一次精神“重新抖擞”的发光年代。几十年,龙生龙凤生凤、英雄好汉、反动混蛋——仿佛天降的全民科举,使弓背弯腰的人们脸上的罪孽红字或火焰金印仿佛瞬间消弭。进京赶考,范进中举,无数平民浪子一举升天的故事,一夜传遍天下。

人的变故,就是天下的变故。一件事情发生后,埋藏在其后的一系列事情注定接着发生。在此后来临的民主精神闪光后,一

年连接一年、持续不断地，中国大地上呈现了一次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横跨几十年时空的诗歌热潮。

两条彩虹同时升起，英雄必然辈出。

这就是本书之所以诞生的背景。

天公抖擞，人随之抖擞。

1978年春，二十七万名“才子”突然从乡野市镇深处沛然涌出。中国压抑的智慧与自由，最先在大学生校园睁开眼睛。

从一名豆腐厂的锅炉工摇身一变成为坐在吉林大学中文系课堂上的一名学生，我目睹了中国大学内外出现的史无前例混乱与新奇：班里年龄最小的只十六岁，而最大的是他的二倍三十二岁……刚刚获得话语豁免权的教师正匆忙准备教案……步入中年的“学生”不时写信回家告慰妻小……那时，与我们同期就读的，还有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他们对大学“上、管、改”的统帅般地位并没有明令撤销，其身上醒目的军装与头上的闪闪红星，似乎仍带着那个时期的威严。

然而，无数只假设的雄鹰正在从鸡群中飞起。受惠的兴奋与短暂的角色慌张后，七七级在各大学迅速被传得神乎其神。他们中的佼佼者，在基础课堂上常常伏案大睡。其质疑的目光与挑剔的口吻，令刚刚苏醒的教师们倍感心怯。而只有七七级自己才更记忆犹新，所谓“藏龙卧虎”的时代宠儿们，几个月前，还在大山深处或城市的底层，遭受着权势者与文盲们的白眼。

一种莫名的愤懑情绪和潜在的变革意愿，悄然浮动。

虽然尴尬与交锋，偶尔在变形的师生之间出现，但大劫难之后，同病相怜的人们在课堂上却上演了一幕幕心领神会的交融。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令我难忘的关键词“牛马走”。这是吉林大学的王孙贻教授，以一个标准的、合格的、饱受苦难的“右派”

身份，在对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讲解中，向未来青年才俊悄悄输送了一种那个时期的切齿之痛。两千多年前一次政治迫害与肉体之辱，被王教授阐释得身心俱焚、意味深长。当时大量政治术语尚未解除禁忌。于是，一种若有所指、似有似无的话语，加倍放大了含沙射影的效果。古汉语的教学目标已退居次席，昔日的“牛马走”们之间，在象征、暗喻中洋溢地享受着无限宽广的心有灵犀、眉目传神、会心一笑，也享受着囚徒们放风时狗胆包天恶作剧般的胆战心惊……那种仿佛地下组织成员与间谍一样的暗号式讲授，包括某些鬼鬼祟祟的倾听者们紧皱的眉头与悄声的密告……后世几乎不可重复。

正是无数的王孙贻先生，以苍老树桩的勃发内心，暗中怂恿与鼓励着整整一个季节的早春枝芽。其时，恰好又逢刚刚开禁的《现代文学史》课程几乎在全国高校同期开课。“五四”后的文学社团高潮——这一被长期遮蔽的历史，被正面、公开宣讲后，像示范性星火，迅速在七七、七八级大学生中蔓延，民间性的文学结社，突然大面积兴起！

1979年夏秋之交，仅在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一个班内，便突然诞生了三个文学社团。其中“赤子心”诗社，最多时成员达二十四名，超过八十人大班的四分之一。而作为中文系系刊的《红叶》，则由七七、七八级与七六级工农兵学员等三届学生会联合主办。

一项失传多年的公民权利，被突然莫名获得。全国各省大学院校异床同梦地忽然爆发了民间文学社团的盛大高潮。那种仿佛大赦天下的感觉，在未来青年诗人作家们心中带来的是比社会实际宽容度高出几倍的放肆夸张效果。

在需要英雄的时刻，小人物纷纷登场。

在各大学，一批民间文学社团的领袖人物应运而生。这些昔日被黄沙埋没的人们，正在书写自己苦尽甘来的锦绣前程。他们的文学才华突然放出光芒。他们的领导才能莫名地油然而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人刚刚离开的那些单位与部门，他们桀骜不驯的性格、对抗领导的拙劣情商，曾经令这些呆头呆脑的才子们吃尽了苦头。

《历史时刻在挑选酋长》，这是我前几年为“十大新锐批评家”评选写的文章题目。我现在想说的是，历史选择的速度总是惊人。随着全国高等院校民间社团刊物之间的交流，各大大专院校的办刊者们开始了频繁沟通。在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QQ、没有电邮的年代，亲笔写信成为远隔千里的大学生们交流思想信息的唯一通道。我至今仍怀念当年与各大学社团头目的通讯联系。文学观念的交流、组织建制的沟通、天下大事的评说……无名的亢奋，没有一分钱的功利，却几页、十几页纸地奋笔疾书……在当年孤冷、闭塞的人际交流背景下，人们的通讯录都少得可怜。而在大学之间，突然间获得的各省、市、地的陌生名单，带给当年的大学才子多少兴奋。可以想象，一封封热情如火的信件在几十所大学之间飞奔往返，像密集的曳光弹或远程火炮一颗颗划破了当年漆黑的人间夜空……事情总是有一，就有二。随着这种激情信息的沟通与火热思想的交集，中国大学民间刊物的联合之势已不可避免，位于中国地理中心区位的武汉大学最终成为它的倡导源头。

作为大学社团民刊行思潮的升级版，《这一代》的出现，也许过于急切和超前，但联合已经必然。迅速汇集起来的洪流需要更大、更宽广的出口。急切膨胀的文学观念也需要一种更刺激、更过瘾的传播。也许《这一代》的短命又是一种必然，但它还是太激进了一点，夭折得也太惨烈了一点。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一代》悲壮的结局可能恰恰最好。忧伤而凄美，反倒使我们因同情与惋惜对其充满了眷恋。

其实，中国20世纪80年代大学社团最兴奋、最高潮的阶段，甚至还不到一个完整四年学制的一小段时间。最初的、一年多的发轫期，最刺激，也最盛大。七七级、七八级离校后，社团的框架基本得以保留，再次成为第三代诗人的出发点。这一批继往开来的诗人群体的成长期，大多数在大学里完成。而伴随着诗的中兴（1985—

1988年），大学校园又形成一次小小的高潮。1989年以后，终于使这一段特殊的文学社团大观归入20世纪90年代的时光。

作为明晃晃的果实，从这些社团中走出了一大批作家、诗人，这些人成为未来年代中国文坛重要的组成。这一点已经成为常识。

我要说的，是另一种隐形的效应。

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除了照亮当事者之外，它暗中向四面八方放射的力量往往被忽略。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精英们的文学活动，类似一次巨量萤火虫们的超级大聚集。那些小昆虫发出的光，不仅照亮了自己的屁股，也一定照亮了周边小小的空间。那些看不见的光芒，那些暗中的力量，一定照亮了无数身边的、和20世纪80年代诗歌运动毫不相关的、一大批不知名人物。

“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倒炕”——行文至此，我无法绕过这句粗俗的东北话。我的西式语法无法抵挡它凶狠的力量。这一著名的时间意义上的“胖瘦理论”，用在七七、七八级的各类班史中实在是太精彩、太贴切。事实证明，在很多大学里，类似的胖瘦角色演变都无一例外地发生。当初叱咤风云的才子们，有点像一鸣惊人的神童，此后的人生中却并无多大长进。相反，那些躲在他们光辉后面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们，却往往厚积薄发、热力发散、大放光彩。这些小人物，也许就是老狼歌中的“睡在我下铺的兄弟”。他们当年可能没有参加任何文学社团，甚至不热爱诗与文学。但他们也与精英们一起，共同经历了那个诗歌热潮。可以说，他们是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史中的一种“暗物质”，是其数量庞大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更近距离地欣赏并感受着诗所散发出来的生命之光。由于亲身亲眼亲耳，这种光，更亮，更强，也更亲切，更温暖，更真实。同时，恰恰由于他们与诗歌的陌生关系，诗歌之光在他们那里反而产生了更大的化学反应。这些貌似沉睡的“下铺兄弟”们，成了一幕历史戏剧中离舞台最近的观众，很多人甚至一直混在演员与后台剧组人员之中。他们，可能是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最大的受益者群体……因此，从诗歌熏陶、诗歌教育、诗歌影响的角度，那一场校园风云，倒像是为后来的主角们有意导演的一幕诗歌专场大戏。镁光灯下

的表演者，照本宣科地念着唱词，而台下的人们却被感动得热泪
涕零。那些无声无息的观众中，恰恰隐藏着日后的商界大鳄、霸
道总裁，或者遍布于这个国家四面八方的大小官吏……他们学生
时代被诗歌一针针击中的心灵，一定被暗中植入了某种敬畏与悲
悯。若干年后，中国辽阔国土上发生的每一件小事，都可能因此
而被悄悄地改变。

任何事件，都隐藏着某种承续与繁殖的能力。

历史像一根永远延长的甘蔗。最甜的部分注定一天天发黑、
苍老。而最嫩的尖芽，终将吸收一切糖分，成为未来的主干。

几十年前横空出世的那两道彩虹升起的时候，除了“下铺兄
弟”之外，在辽阔的土地上，还站着无数仰望星空的孩子——当
20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里涌荡着一浪一浪诗潮时，在更多的中
学生校园里，诗歌的酵母也唤醒了成千上万的未来诗人。他们模
仿着前辈兄姊，串联、结社、出刊……同样形成了一场波澜壮阔
的诗歌江湖。那是另一节更新鲜的甘蔗，另一幕属于他们自己年
华的诗剧。

作为本书序言，我有责任指出：无论是当代中国现代诗史，
还是当代思想史，20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曾出现的大规模结社
及写作热潮，对于本民族来说，都是难以为继的珍贵史料。当这
一运动的主角们垂垂老矣之际，对这一断代历史遗迹的捕捉、搜
寻，再次由中学生诗潮的“孩子”完成。他们像执意续写“家史”
的后生，不惜四处叩门、刨根问底、追寻旧迹。当往事正在随风
暗淡，他们用一个个汉字使之存留下来、凝固下来。

长虹贯日的日子我们还能经历吗？

此举此书，足当铭记。

2016年春节于深圳

20世纪80年代的
『诗托邦』

朱子庆

历时数载，姜红伟一路追踪访谈，最终编就《诗歌年代——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如今既已敲定出版社，遂向我邀序，我想，大约由于我亦“诗人同学”，或可为那个已经逝去的“诗歌年代”见证“昨日的世界”吧。然而，断读续读十数日漫读下来，我欲乘风道去的却是：此书重新发现了中国的“80年代”！它不仅仅是那个年代的诗歌，更是那个年代昙花一现的浪漫——“诗歌80人”！那时候中国大地上无数的高校诗社，无数的热血青年诗人，不，可以说整个欣欣向荣的社会家国，就是一块令人神往而圣洁的“诗托邦”——恕我冒昧，杜撰了这么一个诗意而古怪的词为它命名！

诗托邦，这是后“文革”年代（即“新时期”）诞下的宁馨儿。那里面的人的“存在”状态，或许才是彼一时代最堪追怀、艳羨与回味的东西。

“宁馨儿”这个对标致孩子的赞词，已经淡出时代语境很久了。当我写出这个词，不知为何忽然想到一句名言：“这孩子是要死的！”——鲁迅先生说过的话。这话大煞风景，照常理人们

一般是不会说的。但似乎由于鲁迅说了，人们便深刻地记住了。这似乎可为先生训示之一证。

但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现在最想说的是，鲁迅此言有着某种存在主义味道，它因煞风景（又作“杀风景”）而成就自为的“存在”，这才是我们这一代人记忆深刻的原因。人总是要死的，新生婴儿也不例外。这已经是一个既定常识。但为什么在鲁迅那个故事里，它却变成了“烛”与“针”？这是因为它被投入了“实践”，亦即“献身”于特定现实的某种“情境悖逆”中，而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我们还可以举出《皇帝的新衣》）。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它不曾鲜明地“献身”，“照亮”或“刺破”了那些“遮蔽”（喜庆的赞词），就不过是墙脚的一块灰溜溜的石头。现在我们满脑子堆着各种常识，然而，常识常有，那种生杀予夺的“情境悖逆”不常有；更进一步说，“情境悖逆”常有，而敢于掷出真理之石的，又有几人？

以上这些话，和红伟这部书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指出的是，红伟此书正是一部献身于“情境悖逆”的书，一部十分及时的书，或将像一枚激射的石块洞穿某些“遮蔽”，而以其烛照现实不负历史使命。“经济中心”的转轴已不堪重负，“腾飞”的辉煌正暗淡下来，在疲惫人们的“心目”中暗淡下来——年初以来，网上不是已在万众热传、接续这样两句诗吗：“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心目”这个词堪作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词。人的存在是心与目相互传导的结果。存在决定意识，然而心在看，“照亮”一切；即心即目，即目即心，人是用“心”照亮世界的生灵。如果说“合理”系中得心源，“存在”乃基于目下，那么“存在即合理，合理即存在”这主客两端，也只有“心目”这里才能辩证统一起来。适逢这样一个意欲擦亮心灯的时刻，红伟此书招引我们围炉夜话：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

这就说回了本书。我当年是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七八级学生，书中诗人马莉的有关文字，讲述了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的“疯狂表现”。那完全是一个激情的年代，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们在阳光灿烂的消费乐园里——这一点很重要，响应社会上风起云涌的“解冻”思潮，和各地百万大学生诗歌爱好者一样，在青年诗人北岛《今天》的引领下，兴致勃发，遥相呼应，不知疲倦地写诗、结社，演剧、朗诵，到处漫游，寻找同道，还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作为一个20世纪80年代的亲历者，我读红伟此书自然颇多印证和发现，最强烈的感受是一种“穿越”体验——眼前豁然复活了“昨日的世界”。“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天宝盛世的确不是等闲人说得。掩卷回神，却也越发感到：一切已折戟沉沙恍若前朝，化作一帘幽梦。诗评家、“崛起派”猛将钟文“唱衰”时下诗坛，说“当代诗歌正在走向废墟”，我乍一听时不敢苟同，现在很理解了。

所谓“80年代”，是我国结束“文革”动乱后，高层厉行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废止“斗纲”（即“以阶级斗争为纲”），重建生活的年代，那种情形，正像被严冬浩劫过后的一片荒原上，春风春雨，万物复苏。坊间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图书不少，盛称其为“诗歌黄金时代”的文章尤多，但殊少“手把红旗”的“弄潮儿”之手笔——我指的是民刊主编、社团首领以及旗手型诗人，他们是“诗潮”“运动”的兴风作浪者，特定历史事件的幕后推手和动力源。而红伟此书别具只眼，属意和深挖的恰恰是当年担纲大学生诗社的“酋长”们和一地、一群校园“诗人同学”之精英，由此得以探赜索隐，为我们重构出了大泽龙蛇一处处的“诗托邦”——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诗坛是山头林立的诗江湖，那么，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一个特点，是高校里面大大小小的诗歌社团，它们不是扯旗称派的“山寨”和利益集团，而更像是充满幻想和浪漫追求的诗歌公社，我想，叫它作“诗托邦”是颇为恰当的。盛世是要有许许多多的盛事堆塑的，像《今天》杂志引发的诗坛“裂变”，像十三家高校联合主办《这一代》的“流产”，像《诗刊》首届“青春诗会”在虎坊桥“集结”，以及诗

评家徐敬亚《崛起的诗群》的来龙去脉，当然还有诗人韩东的西行入陕播火、传道……桩桩件件，都是注定要记入史诗的，是为不可又再的新诗黄金时代“背书”的大事、壮举。显然，当事人、幕后推手以及在场者们的言说，更趋历史真相、更近设计顶层，讲到细节处，有些篇什更使人身历其境，似有谋划者的咳嗽声从历史深处之墙壁里隐隐传来（如孙武军、徐敬业那两篇）……这为本书平添了不少可读性，使之具有毋庸置疑的（历）史、传（记）的诗歌文献价值。

近年来“圣化”西藏之外的又一思想脉动，是人们开始深情追怀激情的“80年代”。这自然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弹。不久前文化评论家朱大可和诗人欧阳江河的对话，就被冠以《80年代，诗歌在极度不正常的状态下被推到高处》之题，传播网上。朱大可坦陈：“我觉得从80年代初期一直到中期的诗人，中国历史上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现在大家都会缅怀那个时候。反正我个人是很缅怀的，因为我们确实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包括了我们大量的青春记忆、我们的挫折、我们的欢乐，同时我们的信念、我们的理想都是在那个时代，诗歌在那个时代伴随着我们，所以它成了我们灵魂深处的一部分。”朱大可这份感言，可以代表我们这一代过来人的心声。他还描述了当年盛况一景：“那个时候校园全民启动，一个诗人穿得破破烂烂，几个月不洗澡，就拿一本破诗集，在校园里每个寝室门敲过去，就有人接待他，饭票一半都给他，对吧，睡一张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诗人可以混吃混喝，在全中国畅行无阻。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这种状态，在朗诵的时候，底下的女孩子跺着脚涨红着脸，就跟看到港台和韩日歌星一模一样，我们的诗歌是在一种极度不正常的状态下被推到了这样一个高度，实际上是非常奇怪的状态。”这应该是我们七七、七八级学生已经毕业，朦胧诗在两派大论战

中大获全胜，北岛、顾城们南巡川大，是各高校大学生诗潮几近鼎沸的时候吧。徐敬亚推出的《现代诗群体大展》（1986）是“崛起派”完胜后，在诗坛燃放的一束耀眼、瑰丽的烟花，它带来了现代派诗歌的鼎沸和全面展开，动摇和改变了《诗刊》等主流诗刊掌控诗坛的大一统局面，同时也宣告了诗坛“群魔乱舞”的开始——堆凑的诗歌流派可以邀名。此后，开启了后来诗坛名利角逐。这似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人类行事，一旦形成规模、啸聚为“群体性事件”，最后必然以非理性“疯狂”而宣告结束。此后，空寂的诗坛，便一纸风行起了汪国真、席慕蓉的“热潮诗”。今年刚好是老徐“大展”推出三十周年，而红伟此书呈现的，主要是当代大学生诗潮的“早春气象”，彼此参读来阅读是很有意思的。

最后，我想谈谈我对1980诗歌年代的几点认识。

首先，为什么热在诗歌？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普遍的主义信仰、革命激情和浪漫情怀，——给整个社会播下了过量的诗性基因，而历次“运动”空前残酷的斗争，却连同人性一道将其镇制、封埋，此时终于火山喷发。第二，“文革”终结，而浩劫后的世界形同废墟，“一无所有”，“我来到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北岛），而传统积习和最能上手的低文化、低成本操作，便是写诗——散文和小说不属于广大学生、青年群众。第三，放逐者归来，“右派诗人”“胡风分子”、下放干校的“臭老九”乃至修地球的插队知青，此时先后返城、归位、入校，犹如“天亮了，解放了”，“翻身的人们”能不歌唱？第四，“文革”地下诗歌特别是《今天》杂志浮出水面，广为流传，《将军，不能这样做》《小草在歌唱》，伤痕、反思、批判、叛逆的声音，不断突破禁区，启蒙思想，激励更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诗人跟进挥笔。第五，社会进入了文化先行的历史“解冻期”（如恢复高考、恢复报纸杂志和中外经典名著出版），虽然看上去是中国大地“春天来了”，但整个政治体制特别是经济体制（所有制形式）仍然铁板一块，结构“超稳定”，实践有“惯性”，一个“亿万群众”习惯于面朝“理想”（我忽然想到海子的“面朝大海”！），

“奋斗”“运动”“斗争”的封闭社会，一时间进入了“调整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虽已废止，“经济建设为中心”有待体制改革、政策跟进（所有制形式的突破），时代暂时找不着北，而兴致勃勃、精力过剩、激情过剩、体验过剩、求知欲过剩、发表欲（言说）过剩，加以时间过剩，显然也一时“自由”过剩的人们，根本无处宣泄和寄托因压抑而厚积的精神能量。有什么可干？还能干什么？后来崔健在摇滚中吼出的“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一无所有》），道出了那个时代的苦闷。一无所有而“追求”（即“理想”）过剩，这正宜于作诗，因为“诗言志”；那时哪里像现在，整个社会像个巨大的创造、致富、游戏与消费的迷宫，随处可以追求、可以寄托、可以沉迷乃至最后，可以迷失自我。第六，诗人成了第一批“存在人”。在那个内地（大陆）还没有明星的年代（港台歌曲已到处流行），诗人成了“明星”“文化英雄”，诗歌“在一种极度不正常的状态下被推到了这样一个高度”，这看起来畸形又很符合历史逻辑——在每一个畸形的时代后面，必有其畸形的文化生态。为什么那个历史选择了诗人？

除以上所述，此一时期最堪反思的，是人的存在状态。“文革”终结，“两个凡是”终结，“以阶级斗争为纲”终结，这一连串的历史性否决，在根本上是对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先定“本质”的终结。当历史翻过了年年运动月月斗、人人宝书天天读这一页，被改造和洗脑过后已成无主的生灵的人们（没有“自我”，甚至连本性也泯灭了，例如“性爱”），像肥沃的处女地渴望种子和春雨一样，期待、追寻着新的灵魂或曰本质的入驻——看看于坚的《四月之城》，最有名的是顾城这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诗人是存在的发现者、见证人和守护神，不但敏于言，尤敢践于行，所以总会成为先行者

而引领时代（许多党人革命家与之气质潜通，本质上也是诗人）。无忧无虑、意气风发又聚群而居的大学生诗人，自然最是得天独厚——更重要的一点是，七七、七八级大学生群体结构独特，其主体或曰大部分是经过“红卫兵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洗礼、历练的“同学”——生命年轻而非“少年”！是一班有过思想历练与实践的“奋青”（不同于后来的“愤青”，是志在“发奋有为”的青年人）。说来可能很难理解，社会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本质上有着潜通的地方，这就是他们都是“自为的人”——“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文革”期间流行诗句），表达的是人要成为更高尚的存在的内在要求，所以必须诉诸新的实践。所不同的是，前者追求共同本质，而后者追求各异的本质。

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人写诗、结社、编印诗刊（特别是地下刊物）和串联游走，虽然远不像党人革命者搞“运动”那样旗帜鲜明、有组织、有纪律——当年马克思说：“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的时候了……消灭私有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党宣言》）但他们已然开始了自我价值的觉醒及其最初的“革命实践”活动，这是一个人由“自在的”被宰制的存在，向自我意志驱动的“自为的”存在的飞跃，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代“新人”的诞生。看似不是传统典型意义上的“运动”，但是他们“在路上”！（这种介于自发与自觉之间的“实践”，与此前组织领导的和后来商业组织的行为是不一样的，后者已不构成“思想实践”）此所以，大学生诗歌运动有别于其他放逐者归来的言说方式，而“诗歌年代”尤以大学生诗歌运动最具代表性。这是别一意义上的“运动”——当我和诗人马莉躲在她的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狭窄的宿舍里秘密装订地下诗集——马莉自编自印的诗集（还是单位小打字员偷偷帮马莉打印的），这是当年校园内外多少诗歌志士的共同实践和体验——为什么会是“偷偷的”，有“秘密”之感？因为就像鲁迅文章里那个说出“真理”的人一样，我们同处于高压下的“情境悖逆”之中。当一切变得合法而没有撕裂、没有颠覆，简言之，没有“思想实践”，也就是“自为的人”软化为达利画

中的一摊“软钟”，因为不再承担和实现本质而徒有其表了！与诗结伴走过 20 世纪 80 年代的岁月，本质上恰是由于这样的实践和体验，使那个年代变得难忘，因为这是一个“上路”的过程、“本质”附体的过程，是一个自我获得实现的人真正成为人的过程。和今天这个迷失自我的、喧嚣的消费主义时代（“取舍已不再由本心而要由舆论来决定”——茨威格）相比，那个诗歌年代已成“昨日的世界”。

那真是一个诗托邦，那就是一个诗托邦！

在那个诗托邦的诗歌年代，“月亮的柔光，从恶狠狠死沉沉的云层中偶然闪现”！“曾经有过那样的时代，我们的民族幻想着有一种天真烂漫、纯洁本色的美。甚至 1914 年，都还洋溢着这种天真的信任。”（茨威格：《健忘的悲哀》）但是这一切都已随风而逝了！当我们不再年轻，当我们白发苍苍，我们一点也不后悔，只是含笑地对我们的子孙们淡淡地说：“我们也曾经有过如此的热血和激情啊。”

这就是我们的 20 世纪 80 年代——我们这一代的诗托邦。